

西方生态现代化的伦理困境及其超越

鲁明川

(浙大城市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5)

[摘要] 作为西方环境治理领域的重要思潮,西方生态现代化自诞生之日起,市场主义、技术主义、差异主义迅速成为其寻求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统一的理论符号,推动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治理,成为当代西方颇具影响的生态理论学派。但西方生态现代化在优化区域性生态环境的同时,也破坏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空间与道德伦理的秩序,并造成了价值通约主义与公共伦理瓦解的道德伦理困境、技术激进主义与人本性式微的人格伦理困境以及剥夺性积累与全球生态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的环境正义困境。西方生态现代化伦理困境的超越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坚持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理顺人与自然美美与共的伦理关系,重申真善美的正义尺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绿色技术推动人们的绿色生产与绿色生活,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更加公平、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关键词] 西方生态现代化;伦理困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

西方生态现代化作为现代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理论思潮,是西方绿色运动和绿党政治的重要的战略构成,主要是就现代工业社会如何应对生态危机这一现代问题进行的理论分析^{[1]6}。市场机制、科学技术、生态政策和预防性原则是西方生态现代化的三个核心性要素。20世纪80年代,马丁·耶内克(Martin Janicke)首先提出“生态现代化”这一理论概念,认为生态现代化是将生态问题的消解由补救性方案转换为预防策略的过程。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生态理论,约瑟夫·胡伯(Joseph Huber)在此基础上认为生态现代化是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进步的理论,亦是生产和消费模式的生态转型过程^{[2]176}。阿瑟·莫尔(Arthur P. J. Mol)、戴维·索南菲尔德(David A. Sonnenfeld)认为,生态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在于阐明科技创新在环境治理中的关键作用以及明确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改革中的职能定位。^{[3]45}。上述研究初步构建了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框架。总体上,在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家看来,市场经济、科学技术、生态政策管理等手段是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实现良性循环的基础性要素^{[4]96}。这一理论体系的影响范围广泛,涵盖技术革新、生态环境、政策转型、全球自然资源治理体系重构等多个维度,并最终发展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态治理范式。学者从不同学科和角度对生态现代化开展了理论研究和建构,拓展了现代化的理论内容,但经过四十多年的理论与实践,该理论的缺陷与伦理困境逐渐暴露。

国内外学者大多侧重研究西方生态现代化的技术批判、资本逻辑和现代性的文明反思等问题,较少从西方生态现代化的理路内涵、伦理困境的省思与超越展开整体性研究。诚然,上述视角固然

[收稿日期] 2024-05-09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25-07-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3AKS006)

[作者简介] 鲁明川(<https://orcid.org/0000-0001-6768-5794>),浙大城市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大城市学院城市发展与社会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研究。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zjujournals.com/soc>

[网络连续型出版物号] CN 33-6000/C

是生态现代化研究的重要视角,但容易陷入对技术、价值和文明本体的抽象论证循环,最终跌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陷阱。因此,立足于唯物史观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的理路内涵、伦理困境进行学理分析,不仅有助于澄清人们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的理论认识、彰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独特价值,更有助于认识和把握西方生态现代化与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本质区别,推动全球生态治理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

一、西方生态现代化的运思理路和核心要义

西方激进的生态观(“深绿”)将人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力求对所有生命(动物、植物以及整个生态环境圈)予以平等的关怀,认为不发展或限制发展才能使所有生命享有平等的生态份额。面对激进的生态主义思想,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并非生态危机的根源,危机根源在于对自然资源的无偿使用、技术线性发展的缓慢以及资源的全球流动未达至生态循环的契合度,主张以“浅绿”的方式发挥生态资源商品化、技术革新和国际资源流动等基础性要素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试图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作出新的理论阐释。

(一)市场主义:生态资源商品化

资本主义何以出现生态危机以及如何摆脱生态困境?不同理论学派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者反对去工业化和去现代化的生态消极主义观点,认为生态与物质生产具有耦合性,将经济、生态与社会发展视为统一的系统,并认为生态资源商品化可以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的现代化。马丁·耶内克指出:“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迄今为止是卓有成效的……是一种更容易的环境政策方法。”^{[2]177}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的竞争机制毫无疑问是盘活经济的最佳机制,生态自然资源本质是一种商品,赋予生态自然资源适合的价格即可避免资源的破坏与浪费。因为价格机制可以快速地在生产、消费两端进行准确的信息传递,将生态自然资源赋予高昂的价格即可降低生态资源的耗费。在生态现代化理论者看来,资本主义生态危机频发的根源在于没有通过市场供需原则将自然资源纳入生产成本核算,也没有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对自然资源进行市场化的运作与管理,而生态资源商品化是摆脱生态困境的有效方法。生态资源商品化一般包括三个步骤:一是将环境分解为特定的物品和服务,使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分离出来,并使其转化为商品;二是通过建立供求关系对自然资源进行估价;三是设置各种政策和建立市场机制动态调整自然资源的市场价格^{[5]19-20}。正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所言:“对传统经济学家们来讲,生态退化是市场失败的证明。如果环境资产没有通过合理的价格结构完全融入市场体系之中,市场就不可能引导各家公司高效地利用环境资产。因此,环境经济学家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将生态资产转化成可以销售的商品。”^{[5]19}市场化手段将生态资源商品化以及提高环境破坏行为的成本,可有效克服环境治理中的政府失灵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家所主张的生态资源商品化不是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而是在社会生产与消费的活动中兼顾二者,将生态环境要素纳入经济要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无论是企业生产所需要的生态资源还是生产所产生的污染物,都纳入生产成本,如生态税、生态标签、碳排放交易等,污染者都要为生态破坏买单。理性经济人出于对生产成本的考虑,就会从现实经济利益的角度来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资本逻辑与生态保护原则的统一,从而避免生态危机。

(二)技术主义:污染治理的先进化

如何面对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这是西方现代化必须应对和处理的又一

重大现实问题。在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者看来,环境污染甚至生态危机并不可怕,只要技术能够不断革新和进步,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在他们看来,技术进步是治理污染、应对危机的关键,因为工业社会的技术创新足以完成生态环境的绿色修复。“低废”和“无废”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是实现生态经济的必然要求,绿色科技的进步与应用既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可以优化生产流程,进而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促进生产与生态的平衡,实现生态环境污染治理技术由被动应对型向主动预防型转变,推动污染治理由单点式探索转向整体性技术创新,构建污染治理的全链条绿色科技体系。“今天,我们已经掌握了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先进生产技术,这些技术……有效地解决了全球性烟雾、酸雨、有毒性化学品等大部分污染问题。”^{[6]190}譬如:技术水平提高,能源利用率更高,汽车的单位里程油耗更低;太阳能作为新能源代替矿物燃料的使用;矿物燃料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废料通过科学技术再利用或降低污染程度。

现代化本身是以大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引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过程”^{[7]146}。科学技术与资本的相互联合,共同将传统社会塑造为工业化社会与信息化社会。在“浅绿”思潮中,技术革新在现代化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足以弥补生态资源的破坏,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约瑟夫·胡伯(Joseph Huber)因此乐观地评价技术的生态化应用,“肮脏丑陋的工业毛毛虫变成美丽的生态蝴蝶”^{[8]20}。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者认为,技术革新不仅是应对环境污染问题的迫切需要,也是防控污染、美化环境的有效方法。生态危机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由于技术没有得到合理的应用,另一方面是由于技术没有及时革新与进步,自然系统生态循环断裂。在他们看来,技术的合理应用和革新进步驱动西方工业社会转向更节能、更安全、更低碳的全面绿色实践,有利于构筑“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绿色闭环,提升自然界的物质代谢能力,从而控制和预防生态危机,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有机统一与平衡。

(三)差异主义:全球生态资源共享化

如何应对全球生态资源有限并且分布不均的问题,这是西方现代化必须处理的第三个重大现实问题。对此,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者认为,诸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存在丰富的生态资源且未得到充分利用,主张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成本是正相关的关系,即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生态环境污染治理成本也越高;而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污染的治理成本相应较低,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亦较小。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该将这些生态资源共享出来,供发达国家使用,发挥其价值,而富裕国家或地区向贫穷国家或地区免费或低费用转移污染在经济学上是合理的。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基于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的个体的经济价值和生命价值要比发达国家低,且欠发达国家对污染的承受力更强。因而,应当允许和鼓励将污染转移到欠发达国家^{[5]53-54}。在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者看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辟国际市场,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进行的产业和资本输出,虽然免费或低费用使用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生态资源,但在这一过程中,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获得了资金、技术的支持和经济发展的机会,发达国家或地区也获得了自身生态修复的空间和时间,生态资源的全球共享是一个双方共同获益的过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国家或地区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及其评价机制,低工业化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环境污染程度较低;发达国家或地区生产的高投入和总体的高消费要求更多自然资源的投入和使用。从经济效益来看,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共享生态资源、承接生态污染符合经济比较优势和发展实际。在他们看来,全球化时代,生产要素应当自由流动,全球生态资源共享化既是发达国家或地区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彼此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解决全球生态资源有限且分布不均的重要方式。揆诸现实,这实际是生态殖民主义在现代化领域的现实表达。

二、西方生态现代化的伦理困境

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将经济与生态结合起来,谋求经济与生态的共同发展,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确实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生态现代化将社会民主与生态方面的关注比过去所能设想到的还要更加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它拥有属于自己的现实成就。”^{[9]61}但是,西方生态现代化依然坚持的是人与自然二分的运思路径,无论是市场机制、技术革新抑或差异主义都存有利己主义伦理学的倾向,将生态资源的占有与利用视为稳定资本再生产的环节,本质是资本主义在生态维度的改良,无论是从理论内部还是从现实的生态实践看,均不可避免地引致了伦理困境。

(一)价值通约主义与公共伦理的瓦解:西方生态现代化的道德困境

诚然,西方生态现代化在物质生产方面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资源利用率提升尤为明显,但生态资源商品化和私有化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基础上的。万物皆商品,一切都用市场交换价值来衡量、来通约,其本质是功利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市场应用,这必然加剧私人道德与公共伦理的割裂,造成价值通约主义和公共伦理的瓦解。生态资源私有化、自然资源商品化意味着自然界的新陈代谢以及再生产必然受市场规则所“规训”,增强了生态资源的市场寻租和食利性动机,使少数人更加便利地开发自然资源并从中获利。

生态资源商品化倡导者奉行市场主义,认为对于造成破坏生态的行为既不存在伦理评价,也不存在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他人和社会不能以伦理的标尺来评判和指责破坏生态资源的行为,因为污染者已经在经济层面为环境污染付出了代价。在生态资源商品化过程中,市场代表经济美德,价格机制是衡量公共道德秩序、共同体的善和正义的卡尺,它告诉理性经济人,经济手段和机制,“特别是价格机制,是解决生态危机最好的方法”^{[10]148}。在此,绿色、生态、循环、低碳沦为市场主义道德优越性的符号,为利己主义增加了一层生态光环。

马克思对自然的分析是从人化自然角度出发的,生态文明则是生态的文明化,这不仅包含人与其他动植物和自然事物之间的和谐,也包括工业、农业、社会制度、精神文化等领域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生态资源商品化无法使人类与生态环境处于和谐的状态。因为商品化的治理之道不仅会加剧对自然资源拜物教的盲目崇拜,更会使生态治理无法通过个体的道德自律来缓解人与自然的关系^{[11]35},主体趋利性和资源市场化促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为单纯的占有与剥夺,导致金钱律令不断侵蚀公共道德律令。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逻辑在西方生态现代化的理论中被“编织”为剩余价值生产的良性循环,生命的物化与生产资料的物化在市场主义中成为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展开逻辑,狭隘的资本价值观不断侵蚀着前工业社会的社群伦理。在西方,所谓的污染许可证和碳排放税等市场手段非但没有有效消解生态危机,反而造成了利己主义和价值通约主义的盛行。生态资源商品化缺乏道德伦理的考量,导致人的价值观迷失与公共伦理的崩解,并演化为市场操作社会和生态的运行系统。生态资源商品化和私有化使自然界的导向性偏向利己主义,致使自然资源成为可以通过市场转化为金钱、财富以及各种资源的“通货”,优先争夺自然资源的占有者获得更为优先的发展机会,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部分人逐渐信奉“万物皆可商品化”“金钱万能论”,公共伦理的正义价值观不断被冲击,极易滑入桑德尔所指向的“市场社会”:市场成为社会生活的支配性规范,人因市场规训而使主体性弱化^{[12]57}。

事实上,生态危机的出现并非生态资源尚未纳入经济体系,而是大量的生态资源的开采与利用被简化为单纯的市場化和金錢化。当生态产业成为资本增殖的新兴场域,大量资本对生态资源的占有便趋之若鹜,加大了对自然资源的盘剥与破坏力度。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性

存在,被市场简单地分割为不同的碎片纳入价格体系中并用成本收益进行评估与使用。在不改变资本及资本增殖的前提下,迷信市场手段对自然资源进行货币核算和价值通约,迫使生产者和消费者为自然资源耗费买单,往往可能导致自然资源被抽象为纯粹的经济价值,加快了资本对生态资源的占据,无法真正地保护生态环境。西方生态现代化通过市场定价推动生态治理市场化、资本化,短期内看似解决了生态问题甚至生态危机,但最终却导致了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双重破坏。究其原因,在于资本增殖的本性拒斥任何限制,即使是以金钱衡量公共伦理、人的尊严与价值乃至人的生命亦在所不惜。在万物皆可商品化的生态教义中,资本对生物圈加速渗透和改造,生物基因专利权被市场化和私有化,人类的社会生产及社会关系亦不断工具化和物化。加雷斯·戴尔(Gareth Dale)指出,万物商品化的后果是社会团结、信任以及公民权利赖以存在的制度和社会关系趋于瓦解^{[13]291}。

(二)技术激进主义与人本性式微:西方生态现代化的人格困境

科学技术的发明与应用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其在生态领域的广泛应用确实减少了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但是,“科学技术并不是中立的,它反映了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技术模型中嵌入了权力分配、生产关系和劳动分工的等级性”^{[14]72}。马克思业已指出,资本主义技术的应用并不等同于技术的应用。科学技术作为人本质力量的确证,是实现人与自然界解放的条件。但资本主义技术应用往往受到资本的宰制,技术成为资本的基本要素,使自然力的开发与使用服从于资本增殖的需要。在此,技术这一范畴已经成为理解资本运动趋势的基础,甚至成为否定人类社会既定秩序和内在平衡的主要力量^{[15]167}。

激进技术主义割裂了科学与人的社会关联,使人类迷信技术即权力,技术具有了道德合法性和“最终解释权”,使人迷信凭借科学技术即可征服自然和控制生态,技术的指标是效率和物质利益而非伦理道德,生态自然资源的开采与利用无须纳入生态伦理,技术最终可以达成生态环保的要求并实现人类的自由,这无疑割裂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伦理前提,扩大了“强势人类中心主义”的边界。

实际上,西方生态现代化所推行的技术主义不仅没有真正减少全球生态资源需求总量与消费总量,反而使人类陷入了深刻的异化危机之中。在激进的技术主义中,技术成为西方生态现代化的逻各斯与合理性,它不仅构成生态、社会、经济间的中介,而且成为新的且更隐蔽地规训人类的方式,“控制着生态执行的每一步”^{[16]111}。科学技术的普遍化甚至过度化应用弱化了人的主体性,商业化的自然和技术化的自然无论是在认识论意义上,还是在存在论意义上,都意味着人对生态环境的技术崇拜内嵌于人对自身的否定。在激进的技术主义中,技术已经逾越一种手段或工具体系的边界,成为统治自然和控制人类社会的一种力量,只有“顺从技术和科学管理”的人才能符合社会的生态管理。“云、网络、区域、社会图表、生态、大城市、正式和非正式的暴力、怪异的神学,它们相互叠加在一起,正在成为超级系统的技术。”^{[17]52}人本身逐步深陷到技术的控制中,技术由对自然的解放力量变为人类自身解放的桎梏。马尔库塞指出,“技术进步=生活财富的增长=扩大的奴役”^{[18]82}。激进的技术主义实现了对人的控制与规训,颠倒了人与技术主客体的位置。

激进的技术主义本质是技术统治论,不但无法真正解决生态危机,更造成了人本性式微。如马克思所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9]580}。

(三)剥夺性积累与全球生态权利的不平等分配：西方生态现代化的正义困境

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20]3}。罗尔斯虽未提及生态正义,但其观点对分析西方生态现代化造成的剥夺性积累和全球生态权利的不平等分配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从全球生态资源的分配与平衡看,生态现代化的生态差异主义与全球生态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西方生态现代化的核心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变革市场、技术、政策的发展方向以使经济、社会、生态形成循环。但是,在现实的生产领域中,生态与生产的协调是一个普遍的难题。譬如在《京都议定书》中,西方发达国家面对减排量要求,凭借全球碳交易市场和碳补偿机制,大都通过碳交易和与碳排放直接相关度不高的补偿项目来结算,对于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诱因的化石燃料并没有减少排放。事实上,生态差异化正在对原本生态平衡的地区造成严重的生态冲击,并加剧了生态资源在不同国家间的不平等分配。生态差异主义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以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生态空间富余、推动其发展为由,并以环保为借口对这些国家或地区转移污染物和高能耗产业、占有和使用其生态资源的现实路径。

西方生态现代化既没有兼顾普遍正义也没有遵守差序正义。不对等的全球工业化、不平衡的生态资源分配和不公正的全球资源流动,扩大了西方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间的发展鸿沟,不平等的国际生态义务和欠发达国家国内生存权和发展权成为悖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全球生态资源不平等现状和资源共享化体系,最大化地剥夺欠发达国家的生态资源,并以资本和技术换空间实现了本国碳排放的降低。为了获得发展而不得不出卖自身碳排放权的欠发达国家则要承担其带来的污染转移和生态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本、技术、管理模式享受奢华生活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欠发达国家则成为承接发达国家资源消耗产业、污染产业转移的廉价产品国际制造基地,被资本和技术打压为“发达国家的垃圾桶”和“世界垃圾车”。因此,差异主义下的西方生态现代化,不仅没有消除资本的增殖性和扩张性、推动全球生态的差序正义和代内代际生态差序正义,反而加速了全球生态权利的不平等分配,使欠发达国家背负生产落后、生态恶劣的双重负担。生态正义涉及后代人生存、发展的利益,西方生态现代化无法兼容公正的生态伦理原则,保证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造成了全球生态代际的正义困境。

总之,作为一种现实性导向极强的生态环境思潮,西方生态现代化是“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适应环境挑战并强化自身的一个战略”^{[21]20},在现实的实施领域中回避了资本逻辑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仅仅是单纯试图通过市场、技术、政策等方式解决生态问题,并未找到一条有效驾驭资本的绿色发展道路。西方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浅绿”的生态改良模式,其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哲学,理论的整体导向是捍卫资本逻辑的可持续运行,背后的逻辑依然是以利益为导向的生产活动,西方生态现代化的鼻祖马丁·耶内克也承认,“浅绿”的生态模式若无结构性的变革方案,生态可持续发展是难以为继的。一方面,西方生态现代化倡导的市场主义、技术主义、差异主义的生态变革路线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生态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提供了改良主义方案,确实推动了西方社会的绿色转型,但与此同时,其内在的否定性也消解了西方社会进行更深层次绿色革命的可能,“中断了与地球可持续共存的关系”^{[22]370},走的依然是西方近代机械的哲学自然观的老路。另一方面,西方生态现代化的理论主张为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提供了某些借鉴,但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者绝不希望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走上一条类似西方生态现代化的道路,更不可能为这些国家或地区提供或开辟一条生态现代化新路。当下,面对全球生态资源的加速枯竭和生态系统的持续退化,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者依然没有找到有效措施,生态危机也因此出现愈演愈烈之势。

三、构建生态文明伦理共同体:西方生态现代化的省思与超越

西方生态现代化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区域性生态改良的方案,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西方生态现代化并没有摆脱资本“普照的光”,只是“沿着更加有利于环境的路线重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23]193}的尝试,难以符合人与自然整体之间的生态伦理和全球生态的整体性利益。如何提供一种符合全球生态伦理与生态整体性利益的共同行动指南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问题。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本质要求。面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的伦理困境,构建生态文明伦理共同体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其不仅是一种超越西方生态现代化的重要理念,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关涉人与自然关系生态伦理的新实践。生命共同体将人与自然关系的单纯生产视角推进为生命视角,不仅关注人类的生存发展与生命价值追求,更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并将社会生产、人的生命、社会伦理的内在联系有机统一,弥合了西方生态现代化内嵌的人与自然二元认识论,在实践中形成具有全球引领性的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新方案。

(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推动生态资源化和资源生态化

生态文明伦理共同体以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利益作为道德判断的第一原则,是“义利统一体”,是中国生态现代化的现实善表达^{[24]25}。超大人口规模的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现代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压力,这决定了我国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实践要扬弃资本逻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本质区别。生态文明伦理共同体以人的价值的优先性与重要性为首要原则,并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运行规律的基础上,推动生态资源化和资源生态化,实现对资本的有效驾驭,贯彻“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25]362}的要求。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伦理的基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6]50},体现了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内在要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生态伦理的道德依据。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正在由生态伦理的道德依据转化为制度体系,并在实践中形成推动、规范人们现实行动的力量。

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才能更好地解决生态危机。生态资源化和资源生态化恰恰是通过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解决生态矛盾。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既是受自然界制约的存在物,也是通过实践重塑自然的主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既是人类维持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应有之义。当前,生态资源化和资源生态化以马克思自然观为基础,其逻辑起点是通过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促进生态价值的恢复,进而通过明晰产权实现生态资源资产化,促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转化,确保生态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具体而言:在生产环节,加强生态和自然资源的品牌塑造,提升生态产品溢价水平;在流通环节,深化生态资产权益交易体制机制改革,促进生态自然资源的绿色流通;在分配环节,完善生态自然资源要素的分配机制;在消费环节,培育绿色低碳生活和消费方式^{[27]91}。

诚然,西方生态理论界对生命共同体也有相关论述,从早期的动物权利论到生物中心主义及生态中心主义,都曾试图将自然万物纳入生命共同体并赋予相应的道德身份,彰显人类对非人类存在物的道德关怀。但是,依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思维范式难以摆脱资本逻辑,其理论与实践无法

契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现实需要与正义诉求。若依循其理论主张,广大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要么陷入发展陷阱,沦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要么超出客观能力而无法真正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虽然西方生态现代化及其衍生的绿色运动此起彼伏,但全球生态问题特别是生态危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呈现系统性加剧趋势,严重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与西方生态伦理思想不同,在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中,“天人合一”“人与万物齐一”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集中表达,人生于天地之间,既有“天地之心”的道德意识,也有“民胞物与”的道德情怀,倡导“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的自然观,表达了人与自然界是共生依存的有机生命体关系,赋予了自然界道德伦理的合法性。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指导,在充分吸收中华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追求生态德性和尊重自然的生态意识,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要求和现实的社会关系出发,推动生态治理能力和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拒斥了西方资本主义生态思维中的市场万能论与人类中心主义。在现实社会生产中,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推进生态资源化和资源生态化,倡导可持续发展观与可持续的消费观;在生态文明伦理共同体中,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以及“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正确处理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资源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生态资源使用的绿色低碳性。这一辩证关系不仅涵盖人与自然间的主体与客体关系、物质利益与生态利益、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也涵盖了局部发展与整体发展、系统与要素、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利益等丰富内容。

(二)以人为本:以绿色技术推动人们的绿色生产与绿色生活

区别于抽象人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侧重个体需求,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以人为本将人置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与物质生产实践中考察,在自然观中表现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自然生态可持续性的辩证统一。因此,马克思自然观不仅反对人类对自然界的资本主义式剥夺,更反对以市场化、生态化、技术化之名对自然进行压榨。以“浅绿”为特质的西方生态现代化期冀用科技解决一切生态问题,事实上是没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视为有机整体。在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上,生态文明伦理内含共同体系统的思维方法,视科学技术为促进生态伦理的重要手段,人的幸福是内在核心,是由外在指向的物化生活转向内在指向的绿色低碳生活。在技术伦理的思维范式中,生态文明伦理共同体区别于西方生态现代化,前者将科学技术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内部驱动力,以绿色技术推动人们的绿色生产与绿色生活,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具有生态效应,对生态的态度为“遵循自然”;后者对生态的态度为“控制自然”,是在保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增殖的前提下,减少经济发展对生态的破坏。

在生态文明伦理共同体中,绿色科技表达的是一种全新的伦理观,要求科学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超越狭隘的物质主义导向,更加注重生态伦理,兼顾代内、代际公平,兼顾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发展需要以及其他物种的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构建生态文明伦理共同体过程中,必须摒弃西方生态现代化经济至上的资本逻辑,坚持人民至上原则,确立人的价值相较于资本价值的优先性,发展既能改善当下生态环境又能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具有广泛生态前景的绿色科技,具体要求有两方面: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充分激发科学技术参与绿色公共产品的供给,优化各类生产要素的配置,引导科学技术赋能绿色产业的培育和升级;另一方面,在生态文明伦理共同体中坚持系统科学的思维,完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研究和开发既符合生态伦理,又可以促进人们的绿色生产与绿色生活的绿色科技,突破西方生态现代化的人格困境,实现科学技术与人文的有机统一。

构建生态文明伦理共同体,需要建立推动科学技术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把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力量拧成一股绳”^{[28]200}。在市场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绿色科学技术的导向作用,强

化科技和制度连接,加快研发绿色低碳技术,引导市场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克服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困境,实现生态、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统一。在政府方面,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三者的关系,维护生态资源与环境服务的公共属性,完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保障人民群众对自然资源资产的所有人身份与公共利益,完善绿色供给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综合运用财政、税收等多种手段引导绿色产品的生产消费,构建全方位的环境治理体系和风险机制,从源头解决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问题。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29][230]}与内嵌于资本增殖逻辑、试图利用市场经济或是创新科学技术改良绿色工艺的局部型生态现代化不同,生态文明伦理共同体以全新的绿色科技伦理观,消解生态环境保护与现代化发展的二元论模式,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遵循。促进现代科技发展的绿色转型,既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服务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又要贯彻落实经济发展生态良性发展要求,促进生态经济化与经济生态化的统一。

(三) 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实现更加公平、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

西方生态现代化的差异主义倾向本身就是生态非正义的表征,其之所以无法克服生态危机,并在生态领域中产生诸多矛盾与困境,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关系。资本的全球化运动及不均衡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是造成西方生态现代化伦理困境的重要原因。在全球生态治理中,从“南北分歧”到“南北零和博弈”,西方生态现代化的市场主义、技术主义和差异主义三者交织,相互强化,阻碍了生态伦理共同体的形成。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方式必然导致资本对人与自然的宰制,造成人与自然的异化。“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19][34]}失去了“感性的光辉”的自然界仅在资本这一抽象的形式中被压缩成纯粹的有用物,自然的价值被异化成单纯经济效益的使用价值。当前,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在人类社会层面的延展,意味着世界各国人民共享环境的享用权利和共同保护生态的义务。追求全球生态与人类社会共生的生态伦理德性,推动实现更加公平、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这不仅是解决当前西方生态现代化及其理论失效的关键路径,也是实现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内在统一的实践基础。

生态非正义是西方生态现代化的痼疾,难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消解。在现实生态治理实践中,西方生态现代化坚持差异主义,试图通过碳边境调节措施等绿色壁垒,将减排责任转嫁给发展中国家,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以及全球生态利益,无论是财富资源和自然资源都在差异主义政策中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多地占有和使用,富人享有的生态权益远超贫困者,自然资源的掠夺和生产生活垃圾的排放,水源污染、空气污浊、气候变暖、水土流失等生态破坏代价由发展中国家来承担。差异主义的生态现代化只会让发达国家更好地将全世界作为资源库进行自然资源的全球性开发、攫取和剥夺,无法实现真正的生态正义,更遑论推进公平、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西方生态现代化倡导者期冀打着环境保护的“正义之旗”,将生态保护演化成支配世界的手段^{[30][419]}。唯物史观反对抽象地、超历史地谈论公平、正义。西方生态现代化正义伦理困境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生态资源共享化,以仅占世界25%的人口消耗了世界80%的自然资源,却撇清了自身的责任。

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重要主题。只有承认不同主体的差异性并尊重各个国家的发展权,才能彰显生态现代化的伦理之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绿色改良发展模式,它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内在要求,倡导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共同但有区别地承担责任,消解了西方伦理生态的话语霸权,开辟了更为广袤的国际生态空

间。面对全球生态正义困境,我国致力于推动国际生态的差序正义、代内正义、代际正义,这本质上是在推进生态系统的合理化,实现生态正义的理性回归,开辟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文明新形态。人类只有一个共同家园,生态问题关涉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动实现更加公平、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生态文明领域的实践表达。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共建立足于利益最大化的公共性生存生产信念,超越民族国家的壁垒、倡导国内国际协作的全球生态共治工程,旨在推进人与自然共同体的良性共生互动格局,实现一种共享、和谐、可持续的优良生态实践,使全人类享受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成果。若继续秉持人类中心主义或功利主义价值理念,人类社会无疑将陷入生态危机浩劫中。只有全球合作,共同践行绿色生产发展方式,人与自然才能形成真正的地球生命共同体,形成一个普遍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追求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为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近年来,少数发达国家奉行本国利益至上,实行单边主义政策,不仅推卸自身本应履行的国际责任,而且还企图操控国际经贸组织和平台对新兴国家进行规制和封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始终秉持多边主义,勇担责任,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化解全球生态难题,主动提交本国的减排贡献计划,积极推动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的共同体构建。中国在构建生态文明伦理共同体中,一方面对内通过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生态环境,不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另一方面对外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主动履行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能力相匹配的生态治理责任,主动承担生态治理义务,并积极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推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绿色转型,促进全球生态治理向更加公平、科学、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以实际行动展现大国担当和大国风范,成为推动全球生态治理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和引领者。

四、结 语

西方生态现代化对全球生态危机所开展的理论自省,以及诉诸市场经济手段、科学技术创新、生态差异主义等实践策略,虽具有一定的理论敏锐度与生态实践改良的意义,但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试图以生态化外衣维持资本逻辑和物质生产实践的改良方案,无法真正地变革资本增殖与生态危机的必然性,至多只能成为物质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调和剂。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我国构建生态文明伦理共同体的积极行动,不仅突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并生共在的生存伦理的生命价值关切,更是“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31]18-19}的现实表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尊重自然与完善人自身内在一致的发展之路,从伦理价值根源上对西方生态现代化局限性作出的反思,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协调自然空间与社会物质生产空间的有机统一,消解了西方生态现代化的伦理困境,呈现了如何实现生态正义的路径,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提供了真善美的正义尺度,表征为人与自然美美与共的伦理关系,在实践中不断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价值归宿和世界贡献。

【参 考 文 献】

- [1] [荷]阿瑟·莫尔、[美]戴维·索南菲尔德:《世界范围内的生态现代化——观点和关键争论》,张鲲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 [2] 郇庆治、[德]马丁·耶内克:《生态现代化理论:回顾与展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1期,第175-179页。

- [3] Mol A. P. J.,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area of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Geoforum*, Vol, 31, No. 1 (2000), pp. 45-56.
- [4] 郇庆治:《生态现代化理论与绿色变革》,《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2期,第90-98页。
- [5]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 [6] [美]巴里·康芒纳:《与地球和平共处》,王喜六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 [7] 丰子义:《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 [8] Huber J., *Die Regenbogengesellschaft: Ökologie und Sozialpolitik*,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1985.
- [9] [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渠敬东、黄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 [10] [印]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张淑兰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
- [11] 张生:《马克思主义视阈下自然环境商品化的伦理困境与反商品化抗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35-41页。
- [12] [美]迈克尔·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金钱与公正的正面交锋》,邓正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 [13] [英]加雷斯·戴尔:《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焦兵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 [14] 解保军:《生态资本主义批判》,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5年。
- [15] [英]大卫·哈维:《马克思与〈资本论〉》,周大昕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
- [16] Foste J. B., *The Vulnerable Planet: 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9.
- [17] Bratton B., *The Stack*, Cambridge: MIT Press, 2015.
- [18] [德]H. 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任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 [19] [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 [20]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21] Young S., *The Emergence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ntegra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000.
- [22] Foste J. B., *The Ecological Rift: Capitalism's War on the Earth*,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 [23] [澳]约翰·德赖泽克:《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蔺雪春、郭晨星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
- [24] 李建森、翟乐:《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创造及时代超越性》,《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第21-30页。
- [2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 [2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 [27] 孙博文:《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五难”问题及优化路径》,《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第87-97页。
- [28]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
- [29]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
- [30] [捷克]瓦茨拉夫·克劳斯:《环保的暴力》,宋风云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
- [31] 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2年。

Ethical Dilemmas of Wester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ir Transcendence

Lu Mingchuan

(School of Marxism, Hangzhou City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5, China)

Abstract: Wester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as a typical paradigm in the field of Western

ecological governance, takes the “shallow gree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as its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governance paradigm driven by marketism, technicism, and differentialism. This theory posits that the ecological crisis stems from the uncompensated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stagnation of linear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insufficient mobility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Therefore, it advocates for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rough the commodification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the advancement of 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ies, and the global flow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theories, Wester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does indeed hold certain progressive significance in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However, it still adheres to the dualistic thinking that separates humans from nature. The market mechanism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global flow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it promotes all implicitly carry the value of Western supremacy. From both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reality, this presents serious ethical dilemmas: the commodification of all things essentially reflects a utilitarian and Darwinian application of the market, amplifying the market rent-seeking and rentier motivations regarding ecological resources, thereby undermining public ethical consensus. Radical technicism implies that technology possesses moral legitimacy and final interpretative authority, leading to a belief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 conquer and control nature, which results in the alienation of human subjectivity. The global flow of ecological resources effectively maximizes the deprivation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ecological resources by developed countries, exacerbating the imbalanc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Wester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remains oriented towards the capital logic, attempting to evade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between capital logic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hoping to resolve ecological issues solely through market, technology, and policy measures. Consequently, it fails to identify an effective green development path that can harness capital.

To break through the ethical dilemmas of Wester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turn to Marxism, construct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thical community,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s and nature. Specific pathways include: reshaping ecological ethics through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lif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rejecting the market omnipotence and anthropocentrism inherent in the Western capitalist ecological thinking, and promoting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ecological resourceization and resource ecologicalization; developing a human-centered green technology system that drives green production and green living, achieving a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ecology, economy, and society; advocating for the co-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community of life, promoting fairness and justice through reforms in the global ecologic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facilitating sustainable human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reality indicate that only by transcending the capital-centric and technological utopian myths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lif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and clarifying the ethical relationship of “beauty in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can we achieve a tru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humans and nature, providing a new civilizational paradigm for glob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Wester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ethical dilemmas;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